

经典来代替旧经典,通过他们的文学批评设置一种美国文化上的新评价秩序。他们的美国化意识完全打破了文化激进主义对于左翼意识形态固守的可能,集中力量于美国传统的历史建构,即美国精神的追溯与完善。费德勒在倡导美国作家遵循美国经验时,特别强调“如果不知道过去与欧洲,那是希图保证我们自家特异处的最坏方法。”^{[2](P226)}虽然美国现代文学从根本上不能抛弃欧洲传统,但是,在这种不能抛弃的焦虑中,美国个性的“新传统”已经走上前台。

纽约学派极为关注文学传统与文学个性的问题,始终带着强烈的使命感阐释个体与文化的关系。当纽约学派开始发掘美国文学传统的丰富性时,这相当于表明,他们需要并且可能为美国现代文学想象出一个丰富的美国自己的传统,即所谓的“美国经验”、“美国形象”、“美国精神”等,以便建构独特的美国文化,充分唤起美国作家和公众对美国文学的信心,推动美国文学和美国文化真正走向个性的独立。菲利普斯和拉夫最初对于文学传统的重视,还主要表现在对于过去文学标准的尊重。他们坚持文学批评标准有永恒的一面,不愿意完全抛弃所有传统的批评标准,即使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提出这样的激进主义要求。他们辩证地看待传统,既不全盘接受也不全盘否定;既视之为激进主义文学的基础和文学批评的必要历史背景,又拒斥其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意识形态因素。他们对艾略特的评价,集中反映了这种立场。他们把艾略特视作美国现代主义文学传统的一个典型代表,把解释艾略特激进的文学技巧和保守的政治立场的共存看成一个重要问题。菲利普斯曾经尝试写一本书来探讨这个问题,尽管最终没有完成,但表明了他通过构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来解释这类矛盾的努力。^{[3](P111)}他公开指责艾略特保守的政治和宗教立场,认为艾略特虽然没有直接投身于法西斯,但其封建的和天主教的立场却毫无疑问地指向了这种反动的思想倾向。^{[4](P52)}尽管如此,菲利普斯还是把重点放

在肯定艾略特保守的政治立场和激进的文学技巧相契合所具有的传统价值上。

艾略特的诗歌和批评都很关注现代性和传统的意义,而马克思也从政治的角度关注到这两个方面。^{[5](P173-174)}拉夫注重挖掘艾略特诗歌所隐含的时代精神。在拉夫看来,艾略特的矛盾并不在于他的晦涩难懂,而是经历了战后觉醒的整个复杂过程,即现代思想形成过程中精神方面和智识方面的所有折磨和徒劳无功,敏锐地以文学的方式触摸到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与此同时,艾略特又是与历史步调不一致的,没有意识到激进主义在文学中的真正价值。像艾略特、乔伊斯这些曾经的先锋作家,其作品所表现出的对中产阶级生活的拒斥,尽管也激发了社会反思,但没能跳出消极论的牢笼对资本主义社会作出批判。激进主义文学则更好地思考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问题,主张建立一个新的社会,超越了以往的文学。^{[6](P37-42)}拉夫称赞一些新近的小说家既避免了公式化的激进主义意识,又避免了拒绝文学传统的错误。^{[7](P52)}对于文化复兴和新文学运动胜利的信念,促使拉夫相信保持文学的激进主义性质和保持文学传统是可以共存的。

艾略特自己始终不愿被归入现代主义诗人的行列,而以强调经典和传统著称。他在继承传统上的强烈的历史感,为纽约批评家所认同。艾略特认为,“如果传统的方式仅限于追随前一代,或仅限于盲目地或胆怯地墨守前一代成功的地方,‘传统’自然是不足称道了”,但是,传统的意义要大得多,需要努力探求才能获得。传统所含有的历史意识“不仅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不仅要求文学创作结合作家所处的时代背景,并与荷马以来的整个欧洲文学和自己国家的整个文学组成一个同时共存的局面,而且要求文学批评把作家放在前人之间来加以裁判,这样的批评原则既是“历史的”又是“美学的”。^{[8](P28-29)}因此,就个人与传统的关系而言,传统是一个同时共存的理想秩序,这个秩序会由于新作品的加入而发生变化。任何文学作品都会融

入过去与现在的系统,必然对过去和现在的互文本发生作用。在此前提下,它的意义也需依据它与整个现存秩序的关系加以评价。^{[9](P29)}现代并不意味着反传统,而是为传统增添新的内容;现代也不意味着否定经典,因为否定经典就丧失了历史意识,没有延续性的传统与现代都是苍白无力的。

二

历史的错综复杂之处就在于,艾略特的非个性论,却成为新批评文本中心形式主义的理论基石。非个性论切断了作家与作品的联系,要求诗歌批评将注意力从诗人转向诗,集中在作品本身。这种思想倾向对新批评影响深远,使其保持与传统批评从社会历史、道德、心理方面或者从作家个人方面分析作品截然不同的面貌。艾略特甚至因之被视作英美新批评派的创始人之一,而新批评的兴盛也反过来提升了艾略特的影响和地位。艾略特认为,“一个艺术家的前进意味着不断地牺牲自己,不断地消灭自己的个性”,“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自然,只有有个性和感情的人才会知道要逃避这种东西是什么意义。”他承认诗歌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是表达情感的,但诗歌表达的不是诗人的个人情感,而是“许多经验的集中,集中后所发生的新东西”。所以,从根本上说,诗不是感情,其价值不在于感情的伟大与强烈,而在于艺术过程的强烈。诗人没有什么个性可以表现,只是运用种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来使种种印象和经验相互结合。“诚实的批评和敏感的鉴赏,并不注意诗人,而注意诗。”^{[8](P31-35)}但是,艾略特并没有因此把诗歌看成一种可有可无的装饰品,而是强调诗歌应当面对社会,唤起公众与诗人的共鸣,鼓励公众的积极参与,提高公众的欣赏情趣,振兴民族文化。这又与纽约学派踏在了一个节拍上。

宣称与政治和历史割裂的新批评,也为美国文学的民族特色作出了贡献,即通过学院教育广泛传播新批评的文学研究方法,为将美国文学建

构为一门独立的研究学科奠定了基础。但是,美国新批评派从总体上不信任文学的民族主义,因为“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的自主性要求超越民族性,因为民族性是诗结构之外的因素”^{[10](P294)}。美国新批评派一直是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反对者,对现代科技的侵扰所造成的作家权威和影响的削弱深感不安。可是,一方面他们并不批判现代文学,而是欣赏现代文学,力求理解和引导读者理解现代文学中最美好的东西;另一方面,这种理解囿于“发现或创造了一个他们能够在其中生活和奔忙的世界,而对美国或者世界所发生的种种事态则可以不予理会”的境地中。这样,美国新批评派就“与他们所讨论的文学作品的社会内容割断了联系”。^{[11](P321)}

威尔逊则为纽约学派的批评姿态定下另一种基调,即毫无畏惧地面对现代社会,运用多种理论和方法表明对现代文学的丰富性和正确性的坚定信念。普鲁斯特、叶芝、乔伊斯、艾略特之所以能够取得崇高的文学声望,海明威、马尔罗、多斯·帕索斯、亨利·米勒、约翰·奥哈拉的早期作品之所以能够获得批评界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威尔逊对他们作品的详细阐释。在阐释过程中,美国文学的现代主义传统日渐生成。菲利普斯早期的《三代人》(1934)一文,尝试概括美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性质和方向。他提出,20世纪10、20、30年代的这三代美国文学家,形成了一种辩证的模式,即前两代人提供了对立的倾向,而最年青的一代对此提供了综合,把文学提升到新的高度,成熟的美国文学与成熟的美国文化携手出现了。第一代作为“社会学的一代(sociological generation)”,扎根于乡村美国的赤裸裸的事实,信奉自然主义,但远远落在欧洲文学的后面。第二代作为“失去的一代(lost generation)”,摆脱了美国土壤的束缚,发展出一种更老练、更文雅、更敏锐的文学,与欧洲文学在同一水平上发展,文学批评也更加精微更有见地。第三代则是“无产阶级的一代(proletarian generation)”,经历了美国地方主义和流亡者的世界主义的辩证交互,

络,试图理清美国现代文学与欧洲传统和美国现代生活的种种关系,重新发现具有美国文明特点的价值与形象,努力确立一个独立的美国文化传统。这种美国传统的建构,在当时就意味着独立的美国文学个性的形成。19世纪90年代美国现实主义已经初露端倪,豪威尔斯此时首开美国现代文学的先河。虽然受到欧洲现实主义的影响,美国现实主义还是呈现出美国本土的特色——作品内容反映了内战后整整一代人的幻灭感和疏离感,表达了平民主义思想和对个人自由的追求,艺术上简单直白,乡土气息浓郁。正是这种与社会的疏离感,标志着美国现代精神的开始。^{[18](P26)}

在《阿克瑟尔的城堡》(1931)一书中,威尔逊已经开始强调“文学个性”问题。威尔逊准确抓住了知识分子感到自己正从一个文化时代过渡到另一个文化时代的精神状态。他注意到,这些象征主义作家在风格和意象方面所进行的积极的文体革新,能够充分彰显作家独有的文学个性。这些作家沉溺于艺术自身,无意去复制社会生活的结构,或者给读者提供道义上的指导。他们以扩大诗歌想象力的名义,将浪漫主义思潮对社会的拒斥推向危险的顶峰;以对主观世界和个人经验的褒奖来漠视读者,蓄意避免介入他们所处的时代生活。他们切断了文学与社会、文学与读者的关联,使文学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这种退入“白色象牙塔”的做法导致普遍的文化枯竭:要么走阿克瑟尔的道路,“退出生活的场域”,“把自己关在私人的世界里,培养一己的幻想,鼓励一己的疯狂,宁肯相信自己最荒诞不经的选择而不取外在世界惊人的现实”;要么就与兰波一起“避走到另一种纯粹是以行动自决的原始文明生活里去”,单纯的求生紧迫感替代了对艺术的需要。^{[19](P190,201,204)}由于美国社会的现实迫使知识分子越来越陷入权力和政治的漩涡,美国作家不可能再以象征主义者为楷模。威尔逊参加过20世纪20年代美国文学界的各种运动,又常常为美国作家对传统的美国生活的疏离感所困扰。然而,作家既不能脱离现实生活,也不

能成为政治观念的传声筒。文学作品真正的精髓就在于作家完整的文学个性,象征主义在这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威尔逊希望,美国作家承继象征主义凸显文学个性的艺术技巧和价值观念,创建一种结合象征主义和自然主义、艺术精神和社会觉悟以及个人感觉和公众经验的美国文学。

拉夫的著名文章《苍白脸和红皮肤》(1939)从另一个角度延伸了威尔逊的观点。他简明概括了美国文学的两大文化传统,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苍白脸是贵族的,“高格调”的;红皮肤是平民的,“低格调”的,为它的美国特性而自豪。从它们的美学理想来看,苍白脸对寓意和象征主义的提炼方法感兴趣,红皮肤则倾向于一种粗俗而为所欲为的自然主义。这两种类型都把经验作为最高的审判者,分别以詹姆斯和惠特曼为代表。值得注意的在于,惠特曼的文化趣味低俗的背后,深层的诉求却是美国个性。在《美国写作中的经验崇拜》(1940)一文中,拉夫又发展和修正了这一思想。他反观30年代的激进文学,认为那些作品往往缺乏深度的个人经验和人生片段。作家不善于在历史的层面上体验人生,没有把人生注入文学,作品通常思想褊狭和缺乏洞察力。一个真正民族性的经验主题能够弥补“苍白脸”和“红皮肤”这两种传统的隔阂,而詹姆斯和惠特曼就是美国现代脉络的首开先河者,二者在历史上相互联系地反映于推翻赤裸裸讲究功利的清教徒准则的根本大业之中。^{[20](P10,14)}但是,拉夫预言,这种经验崇拜造成的内外人生的分离即将结束,美国知识分子的国际视野必将弥补这道鸿沟并主导美国文化。美国现代文学必将融合“苍白脸”和“红皮肤”这两种传统而走向成熟。

简而言之,伴随着20世纪的到来,美国文学进入了一个激烈动荡的时代。社会在变革,各种思潮冲击着美国人的思想,文学作品充满反叛精神和乐观的理想主义。高雅文化根基的摧毁,商业社会的悲哀,权力内在的空虚,乌托邦主义的狂热天真,民族意识的日益强烈,从个人解放到思想解放的追求——美国文学在汲取欧洲文化的同

